



一函典籍启新章 五县春秋传旧志

《莘县历代方志集成》编校简况

■ 杜言青

近日,由莘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莘县地方志研究中心编纂的《莘县历代方志集成》付梓面世。全书分原大影印和缩印两种版本,共计二百六十万字,原大影印本约计两万页,缩印本合计五千页,皆限量印行。笔者有幸担任主编,兹述简况如下:

莘县之辖域几与古莘州相仿佛,雄踞鲁西平原,纵跨黄河故道,自古为中原锁钥、通衢要地。今日之版图,涵盖历史悠久的旧莘县、朝城县、观城县全部及范县、濮县(州)之一部。自春秋置邑,秦汉设郡,迨至明清屡经分合,向有“五县合璧”之喻指。五县旧志历史远溯北魏,近延民国。本次所辑,上起明嘉靖六年(1527)《濮州志》,下迄民国三十一年(1942)日伪《莘县县公署三周年纪念日》,凡四百一十五载,囊括莘、朝、观、范、濮五州县志乘三十一部一百八十七卷一百二十一册,约二百六十万字,按区划分编为五卷。各卷统编统装,统一版式,形成较为完备的《莘县历代方志集成》。

《莘县卷》八部五十五卷三十册。莘县志编修可追溯至北魏,至今已有一千五百余年。正德十年(1515),莘县知县王琛督修,教谕吴宗器编纂的《莘县志》刻印发行,是为现存最早的莘县方志。嘉靖二十二年(1543)知县杨鹤增修重刻,按事类划分为十卷,分三册印发,书名仍定为《正德莘

县志》;崇祯四年(1631)知县孙愈贤重修县志,清康熙十一年(1672)知县刘维祜再修,刻为八卷四册。但惜前志早已失传,后志佚失半部。幸有康熙五十六年(1717)知县刘薰增修印行,尚可弥补缺漏;光绪十三年(1887)知县张朝玮监修、阳谷举人孔广海主纂的《续刻莘县志》刻印成书。是志辑补康熙后诸事,扩为十卷,食货、官师、选举、人物续补较备,艺文增补甚丰,装订为六册一函;光绪三十三年(1907)知县周邦表、训导孔昭沅又在前三志基础上纂修了《莘县乡土志》;翌年编为一册一函印行。是志宗教、实业等多为前志所不载,故可补其缺;民国二十三年(1934),县长董兆璠奉令续修县志,书未竣而离任。王嘉猷到任继其事,特聘历下拔贡、前临沂县长严绥之编纂《续修莘县县志》,分装为十二卷首一卷,八册一函,民国二十六年由济南晓东印刷社铅印。在莘县所有旧志中,是志堪称古代莘县的百科之最;民国三十一年(1942),日伪县公署秘书室编印的《莘县县公署三周年纪念日》虽不是标准志书,却也类似简志,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日伪县政权之军政实况。对于后人了解日伪统治,亦可发挥补缺纠错的作用,故附于书卷之末。

《朝城县》七部三十三卷十七册。朝城县旧志编修可追溯至明成化年间,时任教谕孙廉编成世传第一部志稿,至嘉靖十八年(1539)县令周鲁特聘聘网邑贡生谢让纂修县志,遂成刻印最早的二帙八卷本《朝城县志》;万历四十四年(1616)沂州举人张涇来任知县,数月后礼聘宿儒倪汝任、颍川知县周之度开局修志,四十六年编为十卷二十八日,装帧为三册一套。清代朝城县儒学尚有是志,今已不知去向;康熙十二年(1673)县令祖植桐参阅前贤孟兆熊遗稿再启修志,遂成目前所见保存史料最全的四册十卷本县志;清光绪十六年(1890)五月,近代儒学大家黄葆年任知县,首事即为编纂《朝城县志略》。是志类分六门:沿革、田赋、兵制、水利、古迹、灾异,共七纸,虽仅以抄本流传,仍可视作文墨俱佳之善本;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县令程寿武启动乡土志编修,三十一年(1905)县令袁大启延聘善儒吴玉书,拔贡吴式基、张允升加速编修,三十二年(1906)刻印梓行;参编《朝城乡土志》诸贤鉴于康熙十二年(1673)续修县志后,二百四十余年又成空白,共议再续,终因经费困难而一再延宕。民国七年(1918),吴氏等人又自组班底,开民间修志之先河。民国八年(1919)

潘辅臣来任知事,遂于县农会开办志局。翌年杜子楙主政朝城,一集群贤补录编纂,一集筹款付梓,至年底编为二册,与先期所编《朝城县乡土志》及康熙志合为一函梓行。

《观城卷》四部二十九卷十三册。观城县旧志编修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,时任知县乔昆创修,但惜早已失传;清初,曾任峰邑、禹城训导的邑贤张淑宸记载万历十七年(1589)以后观城县人物事迹。至康熙十一年(1672)知县沈孔修、训导刘士聪和观城举人张洞宸等终于编纂出存世最早的观城县志;乾隆三十一年(1766)盛百二来任知县,到任即欲续志,然仅供职数月而未果。后借修历城、东昌、济宁志之便,摘录有涉于观城之内容编为《观录》,为后人续志提供了珍贵素材;道光十八年(1838),知县孙观偶得《观录》大受感发,广集邑贤并亲自编纂,梓印了目前所见最为完备的观城旧志;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夏季,时任训导王培坎受命编纂《观城县乡土志》,两阅月书成梓行,同时成为了本县初级小学教科书。

《范县卷》六部三十二卷十七册。范县最早的县志创修于明弘治十五年(1502),时任教谕周弼撰成志稿而未付梓。嘉靖十四年(1535),教谕东时泰和训导王绎据此进一步修纂,遂成存世第一部八卷本《范县志》;万历四十一年(1613)知县薛之屏特聘致仕贤达范范、赵民怀再修,编为四卷当年刻印,但惜久已失传;清康熙十一年(1672)知县霍之瑄与训导李简身在前志基础上纂修三卷本县志,四十九年(1710)知县张联策奉令再续,仅对前志稍加增补,随后刊印;嘉庆十四年(1809)知县唐展与教谕李又存修成四卷本县志,光绪三十三年(1907)知县杨沂捐廉重印,翌年乡土志脱稿后纂成《范县志续编》一卷,合嘉庆志并为一套,由济南国文报馆石印;光绪三十二年(1906)知县杨沂延聘邑贡生吕维训等突击修乡土志,亦保存记载了范县各方面实况,是研究范县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献;民国二十三年(1934)时任县长张鸿志、张振声奉令续修县志,政府吏员余文凤总纂,合前修各志为一体,编成六卷本《续修范县县志》,翌年由济南志达印刷局铅印。是志参稽旧志,更易篇目,删繁补漏,堪称旧时所修体例最完备、保存史料最丰富的范县方志。

《濮县(州)卷》六部三十八卷三十八册。濮县民国二年(1913)以前多称濮州,最早的州志创修于北宋,

时称《濮州地理志》,元代州及各县亦皆有志,《永乐大典方志辑佚》可证;明嘉靖二年(1523)知州张襄与州判吴爵相继督修,礼聘常熟进士邓叔主纂,于嘉靖六年(1527)纂成存世第一部《濮州志》。十八年(1539)知州李炯仍聘邓叔续修增印,体例内容沿袭前志;万历九年(1581)诗文名家李先芳联手名宦祝尧焕、陈志翰等共创六卷本州志,体例焕然一新,翌年刊刻梓行;清康熙十一年(1672)知州张实斗延聘邑贤南洙源奉徽再修,十二年(1673)依万历志体例编为六卷梓行;康熙四十九年(1710)知州郭琦延聘儒士任焕在前志基础上续编两卷,五十一年(1712)另行刻印;乾隆十九年(1754),知州邵世昌特聘选知县柴揆再续州志,间采前志合而为一,增补内容另行编排。因雍正十三年(1735)降为散州,故范县、观城县、朝城县内容一并删去,乾隆二十年(1755)编为六卷梓行;宣统元年(1909)知州高士英特聘新城(今山东桓台)文士荣相鼎主纂八卷本州志。是志依然沿袭前例,兼续乾隆后诸人事通编而成,同时新增州图表若干,艺文考收录大量碑记及时人奏疏,对研究近代鲁西历史尤其参考价值。

旧县志详载一县之古今地理变化和行政、经济、文化活动,堪称一县之百科全书,其“存史、资治”的功能早被古人发现和利用。历代朝廷都把地方志编纂作为要务,县官位任都把参阅方志、了解地情作为首事,据此兴利除弊,改善生产条件,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。今莘县所涉五县旧志,亦是千百年来自县仁人贤士前赴后继积累的文化遗产。这些旧志或因兵燹水患而湮灭,或因朝代更迭而流散,复经区划变更,存世者百不一。幸存之珍本、善本、孤本,复经岁月剥蚀,消亡之虞日迫。2025年初,幸赖县领导远见卓识,鼎力扶持,诸同仁乃发初志抢救整理之宏业。数月之内,莘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法增不惮寒暑,奔波万里,足迹、通联遍及京沪甬台乃至海外霞藏之所,悉心查阅影印,终将散落寰宇六十余版本汇聚案头。县方志中心主任马章文协调四方,积极破解系列难题,保证了方志整理的如期完成。

本次整理侧重有三:一是在完成莘县、朝城、观城、范县部分旧志点校注释的基础上,对缺略漫漶部分复原补齐,花费大量精力对照不同版本逐字比对并三改全稿;二是在阅读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》及各类地方通志、府志、州志和县志的基础上,撰写五县区划沿革详述及历代修志简况;三是在精研全部旧志的基础上为各部旧志梳理概要,以求准确无误。

此次集印,实乃萃集莘城方志,服务当今,福泽后世之盛典。一年之期,着实不易,尽管夜以继日,呕心沥血,不足之处仍难避免,惟望方家大儒不吝指正。

猪龙的整体造型——环状封闭、中有圆孔——可能象征北斗七星环绕北极星旋转的天文现象。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中,紫微垣位居三垣中央,是天帝所居,北极星与北斗七星是其核心成员。玉猪龙以猪首为特征,或因猪在古人的观念中属水、属北、属黑,与玄武星象存在关联。山东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中,玄武的龟首被刻作猪首状,可视作这种观念的延续。

据此,笔者推测,玉猪龙应是礼祀紫微垣的礼玉,同时兼具祭祀玄武星宿的功能。其封闭环形象征天极的永恒与周行,是先民“天垂象,地成形”思维的具体实践。

以上基于红山文化玉器与考古新发现的解读,虽试图搭建起红山文化与黄帝族群、上古天文礼制之间的关联,但仍停留在假说层面,尚未形成定论。黄帝族群与红山文化的关系,尚需更多考古发现与多学科研究的验证。本文提出的几个假说,意在抛砖引玉,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与指正。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,正因不断的探索与争鸣而日益深入。

野史亭下

■ 戴敬仁

侨寓冠氏,初构野史亭

元太宗七年(1235)二三月间,元好问在县令赵天锡帮助下,结束了他“投宿佛屋,夜闻鬼哭”的颠沛流离生活,侨寓冠氏县(今冠县),直至十年(1238)八月离开,这里成为他近四年的安稳栖息之地。

作亭与君乐。金元易帜,社会动荡,在县令赵天锡治下的冠氏县却是乱世桃源。时疆域不大,“登版籍者余三万家,侨寓之民,又倍而三之”(《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》),却涌入大量侨寓之民,其中不乏商贾、杨奂、郭仲通等名士,成为金末元初避难文士的一方乐土。也正是此时,元好问第一次提出建造野史亭、在野修史设想:“我作野史亭,日与诸君期。相从一笑乐,来事无庸知。”(《学东坡移居八首》其八)

当前,诸多学者认为野史亭始建于忻州,此说有失偏颇。元好问初到冠氏租借民居,当年赵天锡便帮助他营建新居。彼时他46岁,与苏轼被贬黄州时同岁,二人同处逆境、同营新居。在黄州苏轼曾作《东坡八首》,新居落成不久,元好问便写下脍炙人口的《学东坡移居八首》以自况,其中写道:“此州多寓士,论年悉肩随。风波同一舟,奚必骨肉为。”“侨寓之身的元好问生活多有不便,却常受大家帮助:酿酒世家倪家善酿“莲花白”,常赠酒予他,李昌以琴艺与他相娱,藏书颇丰的郭侯让他遍览典籍,还常常得到笃学善问赵子的指教,就连原居汴京的旧邻王生也千里访冠氏与其共担饥寒,还有莫逆之交仲通甫常论诗文,王、李两位早年挚友即将归来。诗人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历数友人口,意在感谢大家的关怀帮助,反观自己“惭非一狐腋,不直五豕皮”,内心很是感慨,自觉学识与财力无以回报,便决意建野史亭,让它成为文友“投壶咏咏”“宴享劳”的精神家园,以修史之业答谢知己情谊。此时,在冠氏的寓居友人相依为命,乱世中已形成文人社群,元好问感念朋友接济,在诗中既已言明“我作野史亭”,并要将其作为大家诗文唱和的活动沙龙,没有不建的道理。

据元好问《代冠氏学生修庙学壁记》记载,乙未年(1235),赵天锡修缮,扩建冠氏庙学官,野史亭极可能就建于此时。冠氏庙始建于贞祐初年,紧邻县衙,野史亭疑即此地。这位被诗人誉为“平原君”的县令,不仅出资修学官,更对野史亭的兴建鼎力相助。亭子不大,却成为乱世中的“杏雨桃源”——商挺、杨奂、郭仲通等名士在此宴饮著书、吟咏填词,元好问也一改此前沉郁的“丧乱诗”,一下充满生活气息的“移居诗”,将失国悲怀化作笔底波澜。

野史不“野”,执心修实录

元好问笔下“野史”,是指朝廷官修之外、私人撰写的当代杂史。在野史史却极为严谨,他在《野史亭雨夜感兴》中谈到写史的体会:“私录关赴告,求野或有取。秋兔一寸毫,尽力不易举。”可见,搜集史料不仅要“关赴告”(即关注官方文书),还要“求野”(即广泛搜集民间的传闻、掌故),努力通过多种渠道还原历史全貌。严谨的治史态度,艰难

的搜集整理,往往让他感到,即便用尽全身力气,也难举秋兔一寸之毫。“展转天未明,幽窗响疏雨”,责任的重压,致使其辗转反侧、难以入眠。野史虽以“野”为名,实则体现了其作为史家的严谨、执着和对历史真相的尊重,其著作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。在其采写《壬辰杂编》时,曾了解到金代名将完颜斜烈镇守商州时的一段佳话——他在大竹林搜捕伏兵时,意外发现欧阳修的子孙,随即连同其族属、乡亲三千余人全部释放遣返。这一事迹被元代史臣录入《金史·完颜斜烈传》,不仅填补了欧阳修家族史的相关空白,更成为研究宋金关系的珍贵史料。

元好问还将严谨的治学之风融入家风。在冠氏所作《学东坡移居》中,他明确表达朝代兴衰本是天意,记录史实哪里会全然不顾?他撰写《南冠录》“一语不敢私”,裨官杂说、民间歌谣都如如实录,都要为后世修史提供依据。他还严令子侄们一定要每家备上一书,传之数世,“违吾此言,非元氏子孙”,严词训令,让传史成为家族的义务和担当。

四年侨寓冠氏,虽然环境相对稳定,但生活异常艰辛,一天食仅两顿,棉絮薄如纸,虽然贫病交加,却不羞于贫贱,自得“瓢饮”之乐,傲骨铮铮更显示文化坚守初心。所居茅斋时常漏雨,也怕老鼠毁坏书籍,每成一篇,即付书童抄录,藏之壁穴,还拿出家中唯有的大水缸用来藏书,而用破瓮蓄水,做到防水火防鼠咬。在冠氏期间,元好问写冠氏县诗93首,词24首,文14篇,几乎每8天就有一篇传世著作问世,占其现存著作的十分之一。

著述奠基,诗文以存史

冠氏野史亭下,元好问已着手搜集史料、撰写野史,为后续鸿篇巨著奠定基础。其中《壬辰杂编》聚集天兴三年(1234)汴京被困、金王朝灭亡前后的杂事,推测为金亡后痛定思痛所作,大概率始于聊城羁管期间,定稿于冠氏侨寓之时。该书卷帙不厚,篇幅推测不大,最终是否完全定稿已无从考证,但至少元代史臣编纂《金史》时,此书手稿仍存。元代文坛领袖、总裁《宋史》《辽史》《金史》三史的欧阳玄是欧阳修的直系后人,曾在翰林院旧库找到了元好问手写的《壬辰杂编》,并在《送振先宗室归祖庭》中盛赞元好问“元遗山,金土领袖,生平极重欧公”,足见此书的史料价值。

《中州集》是元好问在冠氏期间潜心编纂的金代诗歌总集,其编纂初衷可追溯至汴京被困时,当时友人曾劝他整理金代诗歌,他却因战乱危急无暇顾及,直至冠氏侨寓,生活稍稳,才得以从容着手。该书共收录金代250余位作者的2116首作品,其中诗2001首、词115首,作者涵盖金朝两位皇帝、朝中大臣,乃至白衣百姓,几乎囊括了金代诗坛全貌。尤为难得的是,元好问为每位作者都撰写了小传,小传不仅记载诗人生平、创作特点,更穿插了诸多金代社会的史料,做到“以诗存人、以人存史”。此书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中金代诗歌研究的空白,更成为元代史臣编纂《金史》的重要参考。其中后三卷尤为特殊,收录诗歌数量少,涉及诗人多,部分诗人入选一首七言绝句,而传记却长达数百字,清晰可见元好问“保存一代历史”的初心,诗歌只是载体,留存金代文脉才是其根本目的。

归乡续志,初心不改。离开冠氏,元好问最初设想王屋山山建堂躬治学,虽然愿望受挫,但撰写野史的初心未改,坚定地称“野史可张本”,始终以保存金源典籍、撰写金史为己任,践行“国亡史兴,己所当为”的担当。回到忻州,元好问再建野史亭,一为安心著述,二为明志不辍。野史亭虽经冠氏、忻州两地兴建,却始终承载着他以一身存一代文脉的千古夙愿。

追寻黄帝族

■ 令狐东昌

近日,中国考古学界公布了2025年度新发现,其中冀西北张家口郑家沟红山文化遗址的确认,引发笔者对黄帝族群来源问题的重新思考。

黄帝之谜:地望问题的再思考

关于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族属与地望,历代文献记载颇多歧异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称黄帝为少典之子,活动于中原地区;而《帝王世纪》则谓黄帝生于寿丘(今山东曲阜一带),属东夷区域;另有说法认为黄帝与炎帝同出姬水,以姬为姓。这些记载的多样性,反映了上古族群流动与融合的复杂性。

长期以来,学界对“涿鹿之战”地望的考证众说纷纭。主流观点将其定位于今张家口涿鹿县。然而笔者曾存疑:若蚩尤属东夷集团,其活动中心在黄河下游地区,黄帝集团或起自关中、豫中,双方为何选择在距各自核心区较远的冀西北进行决

战?从军事地理角度审视,这一选址似乎并不符合常理。

2025年公布的考古新成果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。河北张家口郑家沟遗址发现九座积石冢,属红山文化遗存,其中一号冢出土玉猪龙等典型红山文化玉器。古DNA研究显示,该人群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人群具有高度同源性。这一发现表明,红山文化在晚期(约距今5500—5000年)存在明确的向西、向南拓展趋势。这种人口与文化的扩散,为红山文化与中原、海岱地区的接触与冲突创造了地理条件。

早在十余年前,笔者考察涿鹿“黄帝城”遗址时便产生一种推测:红山文化的创造者,或即后世传说中黄帝族群的核心组成部分。诚然,这一推论尚需更多考古学证据支持,但辽西—冀西北一线在史前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性,正日益凸显。

龙马精神:红山玉龙的 天文礼制内涵

红山文化出土的“中华第一龙”(C形龙)与龙崇拜的起源问题密切相关。该器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,属绿色岫岩玉质,通长50余厘米,龙体呈C形蜿蜒,首尾相接如环。吻部前伸上翘,鼻端平截,双孔,颈背有长鬃21厘米,约占龙体三分之一,整体形态呈现鲜明的马首特征。龙身光素无纹,无鳞无爪,当为龙蛇之体。

《周易·说卦》云:“乾为天,为圆,为君,为父,为玉,为金,为寒,为冰,为大赤,为良马,为老马,为瘠马,为驳马,为木果。”此处虽未直言“龙马”,但乾卦取象于龙,又取象于马,

已隐含龙马相通之意。后世“龙马精神”一语,恐即源于此象。

关于龙的起源,天文学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。中国古代天文学将黄赤道带划分为四象二十八宿,其中东方苍龙七宿(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)因其在春耕时节皆见东方,成为观象授时的关键参照。《周易》乾卦六爻以龙为象,自“潜龙勿用”至“群龙无首”,实即模拟苍龙星宿在夜空中的运行轨迹。当苍龙星宿从银河中冉冉升起之际,对应乾卦九二“见龙在田”,标志着农耕时令的开始。

值得关注的是,甲骨文“龙”字的构形与东方苍龙星宿的排列高度契合。这种一致性揭示:龙崇拜的形成,根植于上古先民对天象的长期观测与认知。C形龙的马首造型,或与乾卦“为良马”的取象相通,是在天为龙,在地为马”观念的物质体现。

玉猪龙:紫微垣的礼祀之器

红山文化玉器中,玉猪龙的年代较早C形龙更早,延续时间也更长。两者虽均呈C形,但形态差异显著:玉猪龙体量较小,一般高约15厘米以下,头部雕刻精细,大耳、长吻、獠牙外露,呈现鲜明的猪首特征。材质多为岫岩软玉,呈牙白色或青黄色。

考古学家冯时先生曾指出,玉猪龙与C形龙应分属不同礼器系统。笔者认同这一判断,并进一步推测,两者的差异源于礼祀对象的不同。天文学考古学研究表明,玉

